

—天星文库·短经典—

Medalony

椭圆浮雕

〔波兰〕索菲亚·纳乌科夫斯卡 著

杨德友 译

—天星文库·短经典—

Medaliony

椭圆浮雕



[波兰]索菲亚·纳乌科夫斯卡 著

杨德友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椭圆浮雕 / (波) 纳乌科夫斯卡著；杨德友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378-4427-7

I. ①椭… II. ①纳… ②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波兰—现代 IV. ①I5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7298号

书名：
椭圆浮雕

著者：(波)索菲亚·纳乌科夫斯卡
译者：杨德友

责任编辑：庞咏平
书籍设计：张永文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571328（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0351-5628680

网 址：<http://www.bwyw.com>

E-mail：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字 数：86千字

印 张：4.875

版 次：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78-4427-7

定 价：18.00元

人为他人制定了这样的命运。

纳乌科夫斯卡 与她的《椭圆浮雕》

索菲亚·纳乌科夫斯卡(1884—1954),波兰著名女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界线》(1935)、短篇小说集《椭圆浮雕》(1946)等。年轻的时候,她参加过青年波兰运动^①;两次大战间的那段时间,她是波兰国际笔会的活跃成员;1937年,她成为波兰文学科学院的第一位女性成员,并担任了华沙文学沙龙的主持人。二战结束后,她曾担任纳粹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职务;之后,曾担任波兰全国咨询委员会委员、立法会委员以及波兰人民共和国议会议员等职务。

《战时日记》:见证和记录

索菲亚·纳乌科夫斯卡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瓦茨瓦夫·纳乌科夫斯基是华沙一位优秀的学者和政论家。

^① 青年波兰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兰的文学运动,中心在克拉科夫。这个运动对19世纪末波兰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她是在现代先锋派浓厚的学术氛围中长大的。但波兰一系列的历史灾变——始于 1905 年俄国革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种族灭绝——动摇了纳乌科夫斯卡的世界。在 1929 年的《谈自己》中，她记述了这种现实观的改变：

在我小的时候，围绕着我的是图书，周围的成年人谈论的是学术，我们的朋友都是学者或者作家。当时我认为，到处都是如此，思想和理念的世界是唯一的现实。后来，我震惊地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之后，纳乌科夫斯卡在《战时日记》中进一步记述了这种改变。二战期间，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焚毁对于纳乌科夫斯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以往那个世界的一切都不再真实，什么也没有留下。”^①周围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死亡，压迫着她，影响着她：

死者。死者。听天由命的人严肃、沉重地走过，跳进火焰，跳进深渊。花园里的女人倾听着滴答的水

^① 1943 年 5 月 7 日日记。纳乌科夫斯卡：《战时日记》，读者出版社，华沙，1970 年，第 280 页。

声。窗口前的男孩。孩子们紧靠在那里。这些意念，我忍受不了。因为这些意念，我正在改变。^①

在华沙犹太人起义之前，作者在《战时日记》1943年1月15日条中明确指出，这种“改变”包含着某种高度的意识，即在某种严格的个人语境中身为作家的任务：

我必须写作的唯一理由是保存生活的愿望，让生活避免丧失或者毁灭。我一向觉得，最艰难的就是描写事件、谈论他人的事；到最后，我终于意识到，我是在保存自己。事情过去而不留痕迹（这种意识）让位于铺天盖地的恐惧。^②

纳乌科夫斯卡意识到，作家的义务就是为周围发生的事做见证，并用语言记录下正从大地上被清除的一切。这就是纳乌科夫斯卡的“改变”。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以及隔离区被摧毁一年后，纳乌科夫斯卡在另一则《战时日记》中表现出一种更为强烈、更为彻底的改变：

① 1943年4月28日的日记。纳乌科夫斯卡：《战时日记》，读者出版社，华沙，1970年，第279页。

② 1943年1月15日的日记。纳乌科夫斯卡：《战时日记》，读者出版社，华沙，1970年，第267页。

空袭把城镇夷为平地。人们在各种情况下死亡，在每种可能的情况下死亡。什么也没有保存下来。对于我来说，一言以蔽之，所有的情况如下。就是说，我在写作。止于写作，写作就是一切。的确如此。因为写作，我拯救了经历。其他则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其他的一切传达给了沉默。^①

此外，这些改变还体现在对周围上演的“人类戏剧”的深度认识以及被占领时期伦理任务的肯定态度。同时，她承认，整体描述是不可能做到的，因而，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要持以缄默。之后，写作与沉默之间的张力重现在《椭圆浮雕》之中，而且变成了言说与保持沉默的伦理问题。

《椭圆浮雕》：保存本源的经历和痕迹

1945年，纳粹占领华沙五年后，纳乌科夫斯卡参加了文学周刊《铁匠作坊》，并且成为纳粹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成员。

伯雷伊莎提议我担任奥斯维辛集中营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

^① 纳乌科夫斯卡：《战时日记》，读者出版社，华沙，1970年，第337页。

这是《战时日记》的最后一条记录。1945年2月10日，纳乌科夫斯卡接受任命，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战时日记》的完结、接受委员会的任命，标志着纳乌科夫斯卡的大屠杀文学回忆录《椭圆浮雕》创作的开始。委员会是在二战结束后便成立的，旨在调查纳粹在波兰土地上的战争罪行，而纳乌科夫斯卡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以及之前的生活经历，将对她创作《椭圆浮雕》产生深远的影响。

纳粹罪行调查委员会设在罗兹。为了做好这个工作，纳乌科夫斯卡曾前往奥斯威辛-布热津卡(奥斯威辛-比尔克瑙)、什图托沃(施图特霍夫，在格但斯克附近)、迈丹奈克(在卢布林附近)、特莱布林卡等多个灭绝之地。

《椭圆浮雕》写于1945年，1946年第一次发表，被认为是大屠杀文学的一部杰作。同样，这部作品也表现了她文学演进的顶峰^①：从花体描写和个性的审美概念，^②到关怀国家民族的命运、关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③再到《寒鸦》(1927)中以事实为依据的描述以及对于文献体的重新评价。

① 摘自《纵览纳乌科夫斯卡的文学发展》。参见海伦娜·扎沃尔斯卡的《纳乌科夫斯卡的〈椭圆浮雕〉》(华沙，国家教育图书出版社，1969年)以及弗沃基米什·乌伊奇克的《索菲亚·纳乌科夫斯卡》(华沙，常识出版社，1973年)。

② 见于《妇女们》(1906)、《公子》(1907)、《镜子》(1913)。

③ 见于《湖上家园》(1925)。

她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创作的作品，作为她在一战后关注的背景，证明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界线》的焦点，是人物性格如何受到社会角色和文化类型的限定。《世界的围墙》(1931) 是通过一系列监狱故事来探察犯罪现象的社会和现实根源。剧本《他的回归日》(1931) 描写了隐藏在每个人身上的潜在的犯罪欲望，而《缺乏耐心》(1939) 则是一部哲理小说，表达了她对邪恶、痛苦和死亡的态度。

在对待反法西斯工作的主题中，纳乌科夫斯卡虽然表现出明显的演进；但在听取讲述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原始材料还是让她在写作中采取了某种革新的方式，采用某种不同的态度。^① 在评论体裁和形式的密切关系时，她论述了对自己的要求：寻找一种新方法来表述大屠杀。

我认为，体裁……决定表达的恰当方式。我在战后参加纳粹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并不是为了寻找写作的素材。在写作《椭圆浮雕》的时候，我并没有

① 卡基米什·布兰迪斯在《索菲亚·纳乌科夫斯卡》（见《铁匠作坊》1947 年第 4 期）一文中对这一变化评论道：“人的心理辽阔大地的发现者，在《椭圆浮雕》中却显得束手无策；似乎事先就知道，以个人的心理是无法揭示包含在这个世界里的问题之谜的。这是纳乌科夫斯卡的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作者无法把人看透，只能予以描写……”

意识到正在创造某种新的技巧：一种和以往作品截然不同的文学模式。单是题材就如此难以把握，感情上也无法承受，因此要求我使用这种的现实主义表述方法。^①

《椭圆浮雕》是第一批最重要的文学记述之一，承担了再现纳粹杀人机器这一挑战。就此而言，《椭圆浮雕》与塔杜施·博罗夫斯基震撼人心的短篇小说集——《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部作品源自塔杜施·博罗夫斯基个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经历。弗沃基米什·乌伊奇克曾高度评价《椭圆浮雕》：

显然，事实是，虽然这些作家(安杰耶夫斯基、普特拉门特、鲁德尼茨基)有能力叙述纳粹罪行的真实情况，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两个人——博罗夫斯基和纳乌科夫斯卡，的确成功地表现了(这些罪行)最重要的方面。^②

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触及了战争经历的不同方面，具有不

① 纳乌科夫斯卡：《作家的十年》，《新文化》1954年第2期。

② 伊奇克：《索菲亚·纳乌科夫斯卡》。

同的艺术价值，都是（除了博罗夫斯基）在谈论面对性格、忍耐和勇气不寻常的考验时个人的悲剧命运。乌伊奇克认为，对比之下，《椭圆浮雕》代表了“占领时期经历的共同性”的少数作品之一。

在评述受欢迎的集中营题材的作品时，皮奥特尔·库西弗查克用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告别玛丽亚》和普里莫·莱维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求生》《觉醒》说：“为了规避这类令人不快的问题，有些人想当然地假定纳粹集中营中所有被监禁的人都是性格出众的人，或者是民族英雄，或者是生来的牺牲者。”大众小说对集中营的描写表现在贩卖太阳神话。这些作品几乎一成不变地集中描写了成功的逃生，比如，美国一部关于萨碧波尔的电影，讲述了成功组织起来的反抗组织以及众多的个人伟绩。看来，一个因高尚事业而死亡的英雄依然是生还者更需要的，生还者需要保存最低限度的人性节操。有的囚徒宣称自己对于人心之善的信赖以及对于罪恶的反抗；而有的囚徒怀疑人性，如帕维尔钦斯卡在奥斯维辛集中发现的那样，他们遵守流行的诫条：“不要损害你的邻居，若有可能，要挽救他。两者相比，前者的得分显然高于后者。”虽然纳乌科夫斯卡谈论的不是个人在集中营的经历，但是她的《椭圆浮雕》是归入博罗夫斯基和莱维作品一类的。

在避免把遇难者神化为英雄或者牺牲品的同时，《椭圆

浮雕》对波兰人民在战争期间经历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沉重的见证以及高深的见解。在感叹纳乌科夫斯卡的成就时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说：

只有深邃的智慧和伟大的情感，才能产生出这样的作品，作品表面上是现代的节制和冷漠，但实际上是在燃烧和激情中产生的。^①

*

《椭圆浮雕》包括八篇短篇小说，是文献散文，是包含种种罪行见证人、受害人证词的文字记录，是关于实地考察和所听到事件的叙述。标题来源于 1944 年 5 月 7 日的《战地日记》：

我沿着林荫道回家，路旁都是坟墓，堆积着成行的尸体。熟识的姓氏，侧影，椭圆浮雕……

她的见证报告是紧凑的，有时候是片段性的；采用的

① 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致索菲亚·纳乌科夫斯卡》，华沙，1953 年。

形式有通过官方验证的，有私人的访谈，也有偶然发生的谈话；而留给作者客观评论的余地很小。主角可以对自己对于“人类戏剧”有限的理解出发来谈论他们自己。与此同时，他们的谈话，却代表了千百万人，让每一个“椭圆浮雕”都变成“人为他人制定了这样的命运”这一原则性主题^①的自然排列。

纳乌科夫斯卡采用文献的形式记述，以求恢复种族灭绝中牺牲者和见证者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声音几乎被纳粹们“吞没”。她强调，生还者谈论亲身经历的词汇，充分而可信（《德沃伊拉·杰洛纳》）。她从事着辛劳的工作，要保存那些不应忘却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抑或是被深深埋葬、自然分解（《人是强壮的》），抑或是因上级的威胁而保持沉默（挂在“施潘纳教授”办公室墙壁上的肥皂“配方”被销毁）。洛尔·舍利解释了使用见证者表现大屠杀的叙事文学策略在伦理学中的正当性质：

放弃对于太过庞大的整体观点的同时偏重于某种本质性的细节，这一做法确立了不应被忽视的个人权利，符合约翰·罗斯金从本源取得事实的观点：“唯一值得阅读的历史是在这部历史探索进程中写出的历史，

① 这个题材的形成见于《战时日记》，1944年7月28日。

从亲历者和旁观者的所做、所见、所闻中写出的历史。”^①

《椭圆浮雕》向读者提供的信息多于单纯的历史记录。该书不仅传达了话语，而且还传达了见证人竭尽全力叙述亲身经历时的语调、手势、姿态等动作。从这些描述中，纳乌科夫斯卡提供了惊人、即时的表现：见证者在“现在”中复述了过去的事件。所有这一切昭然揭示出，这样的事件在这些人的意识和良知中是如何持续存在的。通过记录在纸上的文字描写人的苦难，展现和保存了其本源的经历和痕迹。

《椭圆浮雕》中的某些描写——一个由偶然事件控制的、充满恐怖的时代，一个人说不出在何时、在哪里，或者在什么情况下死亡（《墓园里的女人》《德沃伊拉·杰洛纳》）。在《铁道旁边》中，一个犹太女人面对必死的命运，选择了“不死”，从一列飞驰的列车上逃了出来。但开头的一句话便确认了女人死亡的命运，令事态逆转：

这些死者中还有一个女人，铁道旁的一个年轻女

^① 洛尔·舍利译著：《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体实验与战争研究实验室：二十位妇女的叙述》，梅伦研究大学出版社，旧金山，1991年，第3页。

人，她的逃跑没有成功。

于是，这个垂死的女人的恐惧、痛苦和孤独被平移到了田野：田野被描写成荒芜的、空荡的，而且正向这个女人和村民发出威胁。

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不妨注意一下《铁道旁边》中的村民，他们“拒绝”救助这位受伤的犹太女人。但是，“拒绝”并不能简单地被认定为一个单纯的反犹标识。在德国占领期间，在被占领的国家当中，只有波兰会发生这样的事：为犹太人提供帮助可能会被处以死刑。这不仅是指提供帮助的人，还包括他所有的家人，甚至是其所住村庄里的人。他们可能因此被处以死刑，或者被送到集中营里去。然而，根据耶路撒冷的雅德·瓦舍姆研究院的统计，在战争中挽救了犹太人并获得荣誉的人当中，人数最多的是波兰人。

《坑底》《签证》《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成人和孩子》表明，人性是会堕落到兽性的地步，甚至吃人，或是在“狩猎”的死亡游戏中。在《坑底》中，那个生还者讲到一些因为细小过失而被送进地牢且得不到食物的妇女们：

但是，她们还是吃了东西……有一次，一个人的嘴在咀嚼。另外一个手指甲是红的。她们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在夜里，她们吃了尸体上的肉！

纳乌科夫斯卡揭示出残酷是如何扼杀道德的。在《施潘纳教授》中，那个格但斯克年轻人虽然没有被认定为罪犯，他所有的行为也不会被追究，但在道德上他将被谴责。当法庭问讯其在解剖学研究所的活动时，他认真地、不动声色地谈论处决、讯问和制备尸体的过程，他认为，用人体脂肪生产肥皂正表明德国人有能力完成“无米之炊”。

此外，《施潘纳教授》也表现了法西斯主义如何征服了德国知识分子。面对解剖学研究所同事（施潘纳教授）的工作，随访的德国教授们一直保持着冷静和淡定。他们解释说，这位同事的动机或许来源于对纳粹党的绝对服从，或许来源于为德国经济做贡献的愿望。言下之意，他们可能一直和法西斯党的杀人机器通力合作。

纳乌科夫斯卡把握住了一个关键：死亡不再是一种个人经历，而是集体的经历，而且还是被广泛传播的事件。《墓园里的女人》一开篇，作者就将这两种死亡和两种墓园进行了对比。两种死亡：跳出窗外自杀和逃命；两种墓园：墓园是举办葬礼的传统地点，现在却是燃烧着的犹太人隔离区，人正大量死亡。这样，在高墙分开的两个空间、现实之间，在战前与战时两种暂时的现实之间，她确认了某种裂口。杀人的范围在《签证》里被描述得十分真实，叙事者讲述了集中营里的女人。她们来自南斯拉夫、法国、荷兰、比利时、希腊、波兰、俄罗斯等国。在《人是强壮的》里，